
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
Yu Chi-Chung Cultural & Educational Foundation
第 22 期半年刊 2012 年 9 月出版

董事長的話

余範英董事長：

去年年底就各位董事所關心的台灣邁向永續的挑戰，籌劃「面對公與義-邁向永續」研討會，謝謝各位董事的建議與參與。年初出書後，以「實在年代」命名，並策劃系列講座與對談，擴大民眾的參與，深究國土規劃的推動、全球新政下的台灣經濟轉型與了解社會能量的動員。正如每一次的董事會，期待諸位董事給予基金會與本人策力與方向，將是未來年度關心的走向。

董事建言：

於幼華董事：(書面意見)

1. 政府組織再造應以達成改革之理想與正確的理论基礎為先，斷不能為安撫成員人心而和稀泥，置原標的於不顧。

2. 國土規畫是為區隔環境資源保護或保育的首要步驟，必須以全民充分對話結果為規劃所本。

王汎森董事：

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有三點：

1. 政府整合不夠，政務官無權：台灣政府跨部會間的溝通協調非常差，台灣現在的問題在於沒有跨部會之上的協調機制，以致政策都無法有效推動，而要改革的項目一定是得跨部會，不論是法令調整或其他事項，如果沒有辦法解決跨部會協調不良的問題，台灣就無法前進。

2. 政府官僚心態，公務員無力感強：現在的政府沒人真正有權力，因此就沒人敢真正說要做一件事，如朱敬一所講，政府官員要耗費一整年的時間才能做成二、三件事情。就我看到願景工作室的願景高峰會上所談的、所要推動的，沒有一樣能推。
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
Yu Chi-Chung Cultural & Educational Foundation
第 22 期半年刊 2012 年 9 月出版

3.人才培育困難：大學評鑑僵化，致使高等教育培育的人才無法為社會所用。

朱雲漢董事：

台灣整個大環境、媒體、政黨政治、行政立法的關係等，都是我們要坦然去面對的問題，很多人知道有問題，但在公開論述裡，卻少有人想正面提及，所以我認為基金會認為對的事情、該講的事情，就要不怕得罪電子媒體、立法院、政治人物，因為這幾個環節都是在拖累台灣，使台灣事倍功半的。我們經濟體質、外部瓶頸和環境的脆弱性，在這些東西都要整合各方面的資源，很難完全只靠政府，但這體制已經很多慣性或既有的負面機制，如果不做調整的話，就會走不出來！台灣是不會變希臘，但如果變成像日本的一潭死水，也不行。

劉兆漢董事：

我想請教雲漢兄，很久以來我都在想一個問題，在目前的網路時代，就我們所知的民主國家，他的領導人和政府，都還沒有真正解決治理的問題。民主政治發展至今形成代議制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但現在因為網路的崛起，形成所謂的民粹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政府又該如何治理？

且剛也提到，台灣很多亂象，大多緣自藍綠對立，媒體部分則不管是藍是綠，只要逮到一個缺陷，就是無限放大，就可以不需要擔心他的收視率，總會有人看。而這樣的問題在美國也一樣，表示所有民主社會都遇到一樣的瓶頸，你是學政治的，這問題該如何解決？如果這最基本的東西未解決並找出一個新辦法，我不曉得我們的民主政治會在哪裡？

第二個是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哪裡？現在資本主義的模式是否仍走得下去？像美國的金融風暴及華爾街的所做所為，都很令人不可思議，若資本主義走不下去，和其相關的民主，還走得下去嗎？再加上網路崛起，我不知道民主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事情。

朱雲漢董事：

這是個大哉問，我寫過一篇短文「市場與民主的反思」，就是在談資本主義正在侵蝕民主，美國的問題，第一個是華爾街，第二個是醫療產業，包含保險、藥廠、器材，很難改革，到另個州扶殖另個候選人，就把你拉下來，第三個是軍工複合體。金主，再來是 media group control，美國沒有理性的論述，就變成
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
Yu Chi-Chung Cultural & Educational Foundation
第 22 期半年刊 2012 年 9 月出版

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，各打三大板，這就是「公正客觀」，但對於改變環境並沒有幫助。

施振榮董事：

我認為現在的環境可以用「官不聊生」來形容，就是社會、媒體並沒有給執政者施政的空間。當然，領導人本身亦是責無旁貸，面對各界改革的挑戰，領導人應該真正提出他的論述。我再提出台灣的三個文化問題，一個是價值半盲文化，半盲的意思是我們只看到現在、直接、有形的價值，沒看到未來、間接、無形的價值，所以稱之為半盲；因此做為一個領導人若要創造永續經營的價值，就該全明，而不應半盲。第二，社會資源要有效利用，政府的資源不應該是齊頭主義，而應依照個別情況做最有效的配置。最後一個是行政防弊文化，包含廉政署都是如此思維。防弊思維無法帶來創新，若政府只用防弊方法，大家就什麼事都不用做，只是空轉而已。

許嘉棟董事：

整個政府部門欠缺積極性，主動解決問題的動力非常低，大家都只要不犯錯就好，以金融業來說，主管部門只求不犯錯，並不願意多談金融前瞻性、金融改革等，在這種環境下，一些比較有理想能力的人，都不願到政府來工作，因此政府要留才，真的很難！但要提高公部門效率，人才又是必備的，如此長久發展，對台灣的競爭絕對沒有好處。至於為什麼會這樣？除了媒體、反對黨的牽制之外，誠如王健壯文章所寫，台灣朝野之間無法坐下來好好談，若總是互相牽制，則許多事情都會推動不了。

林聖芬董事：

如果由這角度來講，媒體亂象還沒結束，還會繼續，最簡單就是七月以後的數位化，數位化是進步的象徵，但那代表將有更多的頻道，媒體還會更亂，戒嚴後，我們有無數的大學、媒體，甚至金融機構一度也很多，這是從一種極端到另一種極端，問題是政府能否做到宏觀調控，有效管制。

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1990 年代起進入網路時代，這是一個新的時代，全球化所產生的新興議題，所帶來的影響正反都有，怎麼做動態的平衡？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。現在媒體真的和以前不同，民眾多了發聲管道是很好，但就如潘朵拉
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
Yu Chi-Chung Cultural & Educational Foundation
第 22 期半年刊 2012 年 9 月出版

盒子打開，也有許多問題跟著出來。

黃榮村董事：

公共政策執行要有順序，不能只靠民間做，政府的正規軍要撐起來。民間做的再好，仍然是需要政府來帶頭，永續推動才有力量。

田弘茂董事：

現在問題過多，可以談的角度也很多，我不知從何談起，因此我就補充幾點各位剛談過的問題，再回到基金會如何落實、該怎麼做。

王汎森副院長提到的問題我們都有親身的經驗，部會之間缺乏溝通協調，再加上政務官更動頻繁，致使政策推動無法永續，基層公務員見風轉舵，所以所有計畫都做一半。因此官僚怠惰、敷衍。全球化、數位化的影響，資訊多到無法處理，現代年青人更沒興趣去學怎麼處理，不看需要深入思考的文章。整個世界的變化很快，一個病態在一個國家發生後，就會馬上傳播開來，變成全世界都有的問題。基金會該怎麼做？部會不協調沈痾已久。我們基金會還是得做我們該做的、能夠做、有把握的事，鎖定一些重大議題發聲；總結來說，基金會目前的做法是對的，但如果可以將橫向 NGO 做更多的結合，凝聚社會力，這樣更好。

于宗先董事：

台灣現在各界差異很大，且政黨間不能彼此合作，所以很多政府的計劃無法實現。兼之現在工程招標都以最低標來進行，並沒有辦法做好事，台灣未來究竟該何去何從，我不知道，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要做的應該就是加強和各界的交流，繼續堅持走自己的路。

余範英董事長：

謝謝各位董事對現狀提供的許多關注，給基金會很多新想法。未來基金會的議題將設定讓各界參與的議題，與社群團體結合，加強與歷史悠久的團體，如扶輪社、獅子會、民間 NGO 的互動。